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二辑）

Mental Hygiene of the School Child

学校儿童心理卫生

〔美〕赛门斯 (P. M. Symonds) 著 胡祖阴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二辑）

Mental Hygiene of the School Child

学校儿童心理卫生

〔美〕赛门斯（P.M.Symonds）著·胡祖阴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儿童心理卫生/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心理学)

ISBN 978-7-5520-1830-1

I. ①学…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心理健康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45号

学校儿童心理卫生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30-1/B.205

定价: 86.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3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賽門斯 (P.M.Symonds) 著 胡祖陰 譯

學校兒童心理衛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陳序

現在的學校，完全是傳授智識和技能的機關，對於兒童人格的培養，品性的陶冶，都沒有十分注意到。國語、算術、自然、社會各科目的學習都有專職的教師分別指導，而整個的兒童却反被忽略，無人過問。傳統學校裏的訓育工作，目的僅在維護學校的規律，保持學校的風紀，更談不到積極的人格感化和品性陶冶。

近年來，教育者對於這種枯偏的教育漸感有改革的必要。教訓合一的主張，固不失為對於傳統教育一種有力的糾正，但傳統的學校訓育的觀念須先改造，才能收教訓合一之效。兩年前，黃翼先生曾在中華教育界發表一篇論文，題為學校訓育的改造，主張從心理衛生的觀點來辦理學校訓育。不久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叢刊社又有心理衛生專號的編印，而吳南軒先生提倡尤力。心理衛生的意義始漸為國人所注意。

友人胡祖蔭君，鑒於心理衛生的重要和國內是項專書的缺乏，爰將美國心理學者費門斯博士所著學校兒童的心理衛生一書譯成中文。本書原為一般學校教師和父母而作，故內容切實，文筆通俗；而譯文亦忠實流暢，易於閱讀。本書不但作為大學師範教本頗為相宜，舉凡家庭父母，學校教師以及行政人員，讀此書都可以得着不少的啓迪。個人尤希望負學校訓育的人，能將本書所討論的原則和方法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去，則造福兒童真是不淺呢！承譯者胡君將譯稿見示，既享先睹的權利，樂盡作序的義務，爰誌數語。

以爲介紹。

陳選善

原著者序

這本心理衛生的書籍主要地是爲教師而寫的；書中關於心理衛生原則的應用，多半是涉及學校中的情境。心理衛生是教育中一種新的和受人歡迎的觀點，代表幾種思潮的輻合。顧名思義，牠是廣大的衛生園地中的一部，注重個人的幸福。牠是較新的課程趨向的結晶，這種趨向，重視人格的適應與完成，認爲是教育的重要目標。牠能保藏『整個兒童』的興趣，而是過去學校中分科的課程所要摧殘的。同時牠將過去所認爲是家庭特權的兒童訓練中最後一部的工作，局部地轉移到學校中來。牠將門育的問題集中，在一個新的注意點上，應用最近心理學和人格研究的材料。

雖則這本書原是將心理衛生的意義向教師們解釋，但是書中所討論的原則，要是真正有效的，必須是在兒童幼年時試行起來；因此這本書是每個父母和教師均應人手一編的。

這本書特別地着重心理衛生之積極的和預防的方面。至於怎樣特別的看重，只有請每位讀者檢視現在所有關於討論心理衛生的書籍以後，才能明瞭。心理衛生的原則，是從變態心理學的知識和精神治療術的設施中發源而出，因此心理衛生的教本，多半是充滿了關於行爲和思想之病態方面的名詞。心理衛生與其他方面的衛生不同，相沿地多注重在怎樣改正不良的心理適應或怎樣治療心理的疾病，而少

注重在怎樣預防不良的心理習慣的發生。關聯到教育方面去，心理衛生在實用上幾是完全注意問題兒童的改正工作。因此，這本書中所包含的積極的建議，相信可以滿足過去繼續感覺的需要。

心理衛生在過去三四年中已經抓住了教育者的幻想，將牠當作試金石來改正課程中過分專門化的趨向，這種趨向是隨着我們的分科學校而起的。心理衛生應該透入學校中的各部。我們不應將牠視作一班中要教的一種學科，而應該將牠視作在學校各種人的關係中的明燈。這種心理衛生的觀點，就是注重在了解橫於行為之下的動機和設法適應情境中各種的因素，是在很快地取得訓育的舊觀念而代之。

著者曾參加在白宮舉行之兒童健康與保障會議，並任該會心理衛生分組會主席，那時就感覺心理衛生的新觀點對於教育的重要。本書寫成之最初的動機是受自多瑪伍德博士 (Dr. Thomas D. Wood)，他力勸我預備一種顯示心理衛生對於教育應用之簡短的和明白的教本。書中許多材料都是選自我所教授「青年的適應」一個學程中。我要乘此向選讀這個學程的許多同學表示謝意，因為他們在過去幾個學期中，曾經貢獻了許多的意見和說明而為本書所收進的。

我應該特別地感謝學校評論 (School Review) 和哈佛教師月刊 (Harvard Teachers Record) 的發行人，因為他們特許我重印我從前在這兩種雜誌中所發表的一部份材料。我要感謝文納特卡的學務監督華康明博士 (Dr. Carleton W. Washburne)，他准許我在「訓育」一章中收進他在學校評論

(School Review) 中所發表的三個個案研究。本書末章所選的六個個案研究，是選讀我的「青年的適應」一班同學所做的。我也感謝林登高級中學 (Linden Senior High School) 理科主任佛蘭慈先生 (G. E. Franz) 愛倫城中學 (Allentown High School) 副校長兼男生指導李却遜先生 (James W. Richardson) 哥羅拉多大學 (University of Colorado) 助教授米耳士先生 (Hubert H. Mills) 亞力山大黑米耳吞初級中學 (Alexander Hamilton Junior High School) 西頓先生 (James Kirk Seaton) 紐約亨利訪問看護聯合會 (Henry St. Visiting Nurse Association, N. Y.) 貝蕾女士 (Dorothy M. Bailey) 和布魯克林中學 (Erasmus Hall High School, Brooklyn, N. Y.) 台維斯先生 (Estelle Davis) 因為他們準備了這些研究的材料，而准允我收進本書的。

萊門斯 (Percival M. Symonds)

譯者贅言

本書原名 MENTAL HYGIENE OF THE SCHOOL CHILD，著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教育學教授珀斯博士（PERCIVAL M. SYMONDS）於一九三四年在紐約麥美倫書局（THE MACMILLAN CO.）印行，全書除序文一篇外，有正文二十章，最後附以參考書目及索引。

本書著者曾參加在美國白宮舉行之兒童健康與保障會議，並任該會心理衛生組主席，那時他就感覺心理衛生的新觀點對於教育的重要，他寫成本書之最初動機，是在預備一種顯示心理衛生對於教育應用之簡短的和明白的教本，書中許多材料都是選自他所教授「青年的適應」一個學程中，本書的特點是在着重心理衛生之積極的和預防的方面，代表近來心理衛生研究中一個新的趨向。

誠如著者在原序中所說：「本書原是將心理衛生的意義向教師們解釋，但是書中所討論的原則，要是真正有效的，必須是在兒童幼年時試行起來；因此這本書是每個父母和教師均應人手一編的。」譯者以為非但父母和教師均應一讀此書，就是中小學行政人員和研究兒童教育的人們，也可從閱讀此書中得着莫大的裨益，譯者個人於讀譯此書時就感到有一種深切的啓示，使譯者對於了解和處理整個的兒童獲得一種新的觀點，這不能不說是受本書之賜的。

譯者在進行翻譯本書之時，屢承陳鶴琴先生多方指導並蒙賜借原書；譯畢後，又承陳選蓀先生加以校正，並蒙賜以序文；譯者銘感之餘，特此誌謝。尙有吾友朱君鎮孫對於譯述此書常予鼓勵，吾妻端芳曾將原稿抄寫校閱一遍，亦應乘此表示謝忱。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胡祖蔭於上海